

由學生到「半退休」的老師

穆宏志¹

我們剛剛慶祝輔大神學院到台灣四十週年，它比我早一年來台。但我還是來得及參加正式的開幕。我很清楚記得那天開幕的儀式一揭開圖書館牆上的致謝碑文，也記得當天的夕陽是如何照在碑文上所寫的拉丁文和中文字上。那天，我從新竹來，當時我正在新竹學中文，不太聽得懂大家說了些什麼，但至少我見證了所發生的事。

過了不到三年，我又回到神學院來，這時有了不一樣的態度，此次不是爲了來做兩天的拜訪，而是要在這裏住上幾年（那時，我不曾想到一住就是那麼多年，直到現在）。當時我搬家來神學院，很簡單，不必行李箱，因爲我是從隔壁輔大法管學院的耶穌會團體（當時法管團體分佈在多棟大樓之中）搬過來的，所以只需要慢慢地、一件一件地把衣物輕輕鬆鬆拿過來就行了，我是從 1971 年 8 月 1 日開始搬的……

我們由九月初開始上課（有兩年都是這麼早開學的），爲我個人特別的問題就是「語言」。讀神學，從開始爲我就很大的困難，因爲神學本身跟其他學科很不一樣，又加上語言，尤其是神學專有名詞的中文詞彙都還未固定。梵二（1962~1965 年）才剛閉幕六年，全世界天主教神學院教神學的語言，也都才剛從

¹ 本文作者：穆宏志神父，耶穌會士，現任本神學院聖經學教師。

拉丁語換到本地語言；我們神學院是先轉成英文，以後才在台灣轉成中文。當然，在那麼短的時間裏，中文的神學詞彙不可能都固定好了。其實，這也是把神學院搬來台灣的原因之一：教中國人神學，一定要用中文才行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。雖然，我及一些外國修士必須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。

那時，並沒有任何中文的神學課本或參考書，比方「輔大神學叢書 2」《第二依撒意亞》，都還是當時神學二年級的我所參加一個合作研究課程的成果……。我們外國人有個好處，就是可以閱讀其他語言的書，於是，彌補了我們所聽不懂的和中文說的「缺乏」。記得在第一學期，金象達神父給我們上倫理課時，提供相當長的一個參考書單，當時，就有一個二年級同學這樣提醒我：「除了倫理課之外，還有別的科目呢！」

那時候，準備晉鐸的學生人數比較多，反而教師人數相對地較少，尤其是在「信理」和「倫理」方面，張春申神父為我們教授大部分的重要信理課程。既然他是院長，也努力尋找別科的老師，反而我們（至少我）「祈禱」他找不到……

終於，我畢業了。沒有畢業典禮，那是之後才有的儀式。可以說，我讀書的結束是因為「學年衰亡」了，我的「總考」是在該學期最後一天的下午（1974年6月21日，星期五）；那時候，大部分同學都已經離開了，可以如此說：「1973~74 學年度是平安地死在我的懷抱中。」

三年後，我從羅馬進修歸來，先到新竹的某個堂區去完成耶穌會士培育的最後階段（第三年卒試），在那裏度了八個月。而後，回到神學院，就從那時開始，我成了「老師」。為我而言，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是在1979~80年的開學彌撒，領聖體後，大家靜默時，我往群眾看，聖堂滿了，心想這些人就是我兩個

月後開始教書時課堂上的學生，這時，恐懼深深地佈滿了我的整個身體。

開始上的第一堂課，我依然記得一位在日本教書的西班牙神父跟我說過一句話：「第一天講課，我唯一能注意就是**說完每一句話**。」之後，再次發生同樣的緊張情緒，則是 1981 年元月舉行的神學講習會，我在會中做了第一次的神學學術演講，講題是「新約中的天主聖神」。

如此，我開始了正式又忙碌地負責教授新約課程，會長也吩咐我要開始準備出版一些書。這些都讓我感到很著急，好在阻礙慢慢地、自然地、一一都被克服了。學生很客氣，沒有跟我講他們的抱怨（我不敢說他們沒有抱怨！），專書也一本又一本出版了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，雖然我確實麻煩了不少人。

就這樣，現在我已經接近「半退休」狀態了，雖然我還是希望時間不要太「急迫」地往前進行。